习近平叮嘱我们护好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辛本健 顾 春 王 洲 柴逸扉

“他当年来余村调研，也没准备讲话，但听了我们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的汇报，他十分高兴，即兴讲了很长时间，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后待了近两个小时。”

回忆起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吉调研的情景，时任余村党支部书记的鲍新民至今仍很激动。

■ 鲍新民（时任余村党支部书记）：

“没想到他首先讲生态环保问题”

2005年8月15日下午4点，习近平同志一行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进行调研。

“村里和镇里基层同志先讲，畅所欲言，县里的同志可以作补充。”顶着烈日仔细查看余村民主法治建设宣传栏后，习近平同志在会议室坐下，顾不上擦汗，就让鲍新民第一个发言。

“我紧绷的神经马上放松了下来，没想到省委书记这么随和。”鲍新民回忆，“我接下来汇报时，他一直认真听，并不时对我微笑点头，表示赞许。”

鲍新民在汇报时讲到：依靠炸山开矿和建水泥厂，余村曾经成为安吉首富村，上世纪90年代末村集体年收入曾达300万元。虽然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了，但生态环境也被破坏了：尘土飞扬、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村民不敢开窗，山上连笋都不长了，矿上爆破频出事故……痛定思痛，余村用民主决策的方式选择将高污染企业陆续关停，开始向绿色发展转型。

“关停村里的矿山和水泥厂，得到全村绝大多数村民支持。”鲍新民说，但关了水泥厂和矿区几乎就断了村里的财路，很多村民一下子失业了，村集体年收入最少的时候减少到21万元；而生态旅游怎么搞，能不能搞起来，大家心里也没有底。

“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非常高兴，即兴讲了话。”鲍新民回忆，习近平同志当时来余村调研的主题是民主法治建设，“大家都没想到他听完汇报后会讲那么长，更没想到他首先讲生态环保问题。”

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生态环境问题有着长期思考。

“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不是发展。”

“我们要留下最美好的、最可宝贵的，也要有所不为，这样也许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

“刚才你们讲了，要下决心停掉矿山，这些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安吉的名字，我想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

“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要有所得，有所失……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要知道放弃，要知道选择。”

……

习近平同志结合安吉、余村发展实际，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我们这里8月份天还很热，‘秋老虎’啊！我们看到他的衣服都湿透了。也怪我们粗心，连条毛巾都没准备……”

开完会，村里人都想和习近平同志合张影，但都不好意思提。鲍新民回忆说，“还是他主动招呼我们说，大家过来合个影吧。”

■ 沈铭权（安吉县委书记、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他为我们送来了绿色发展方法论”

2003年4月9日，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约半年后，就曾到安吉调研过。

“那次来安吉，他说，他最早知道安吉的名字是在福建省分管农村工作的时候，知道安吉的竹业经济发展得比较好，老百姓也比较富，这是他对安吉的第一印象。”安吉县委副书记、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德清回忆说。

“习近平同志第二次来安吉，讲话一开头就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话：安且吉兮。他称赞安吉是个好名字，在安吉能感受到一种和谐的氛围。”安吉县委书记、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沈铭权说，“他在这里首次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拨云见日，为我们送来了绿色发展方法论。”

十多年来，安吉县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生态立县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先后获评全国首个气候生态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首批中国生态文明奖，还是我国首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县级城市。

安吉以全国1.8%的竹产量创造了全国20%的竹业产值，去年达到217亿元；白茶产业去年产值达24.57亿元，惠及1.58万户茶农；在建绿色项目174个，总投资达1500多亿元，全部竣工后将为安吉新增4500亿元以上的产出；城乡收入比为1.73∶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没有习书记指点迷津，安吉不可能发展得这么顺利，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最美县域’。”沈铭权说。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时指出，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要下决心舍去严重污染环境的、高能耗的产业，我提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就是这个意思。“这段话我们一直牢记在心。我们认真学习了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感他的生态文明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他当时对我说，一定要把百草原这片山林和湿地保护好，用你们的智慧，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南百草原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崔世豪拿出当时他陪同习近平同志参观时的照片，百感交集。“一开始做生态旅游的时候，并不被人看好，景区开业之初也几乎无人问津，说实话当时心情有些低落。”

到安吉调研时，习近平同志专程到中南百草原考察。崔世豪说，“他考察后不久，我们就投入8000多万元，对中南百草原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提升。去年，我们这里吸引游客138万人次，营业额2亿元，同时带动了2万多名农民就业。没有他当时的叮咛和鼓励，哪会有我们企业的今天！”

■ 谭江洪（天荒坪镇大溪村中山酒楼老板）：

“咱这农家乐得好好开下去，等着习书记再来！”

天荒坪镇大溪村有家名为“中山酒楼”的农家乐，习近平同志两次到安吉调研都是在这里简单用餐。

“2005年8月15日那天，我陪他一直走到二楼，他详细询问村民的就业和收入情况，还问了我好几个经营方面的问题，问得很细。得知我的农家乐做得很红火，他很高兴，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坐下来吃一点，听着既贴心又暖心！”中山酒楼老板谭江洪回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谭江洪早年在当地的江河造纸厂工作。2000年前后，造纸厂因为污染大、效益差而关停。谭江洪凭借灵活的经营头脑，很快开办了这家农家乐，不到两年就买上了小汽车。

“那天我们做的全是普通农家土菜，其中咸肉炖笋、山木耳炖豆腐、萝卜烧肉这3个菜，看得出，他很爱吃。在了解到我是下岗工人创业后，他当场提出这3样菜各加1份。当时听了这话，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谭江洪说，“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下次来安吉还到你家吃。我跟媳妇说，咱这农家乐得好好开下去，等着习书记再来！”

“习近平同志当时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逆城市化会更加明显，一些人可能更喜欢住在农村或郊区。到那时候，安吉更是一块宝地。”沈铭权说，“他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从安吉的情况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判断已经完全成为现实！”

“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生意越来越火，可比以前在水泥厂干强多了！”农家乐“春林山庄”的老板潘春林说起这些，笑得合不拢嘴。“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现在既留住了绿水青山，也挖出了发家致富的金山银山！”

在乡村旅游热的带动下，余村村民俞金宝办起了自己的葡萄采摘园：“我贷了200万元，不过一点不担心！”

“放心吧，他可亏不了！葡萄成熟的时候，正是漂流的旺季，我们两家离得近，到时候来漂流的人谁不来采摘一串！”经营着一家漂流基地的村民胡加兴抢过话头：“每到旺季，来玩漂流的都得排队喽！”

▼ 8月7日，游客在浙江省安吉县大溪村坐云民宿的露台上观景。 新华社记者 马 晶摄

习近平帮我们挖“穷根”

本报记者 魏 贺 李 翔 郑 娜 赵 鹏

◀ 8月5日，游客在宁德市周宁县玛坑乡的生态观光茶园里体验采茶乐趣。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过洋村能有今天，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他到宁德上任后第一次下基层就来到我们村，鼓励大家发挥自身优势，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走林业、种植业等多元发展的道路。”回忆起30年前习近平同志到过洋村调研的情景，69岁的老支书钟祥应清晰如昨。

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闽东9县乡镇，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一心要让乡亲们彻底摆脱贫困。

在这里，他倡导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这里，他强调弱鸟先飞，因地制宜。

■ 刘明华（时任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

他鼓励我们“以干得助”

“下党乡是出了名的‘地僻人难到’，习近平同志是建乡以来第一个到乡里的地区领导。”时任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的刘明华回忆说。

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当年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地直机关18个单位负责同志，来到下党乡现场办公。

那天刚好是大暑的前4天，“日头特别毒”。习近平同志一早从寿宁县城出发，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又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了下党村头的鸾峰桥。

“他汗流浃背，一边拿搭在脖子上的白毛巾擦汗，一边同桥上迎接他的干部群众握手。脱下的白衬衫晾在廊桥上，看上去湿漉漉的。”刘明华说。

喝了一碗乡亲们送来的凉茶，习近平同志当即在鸾峰桥边的小学校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对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杨奕周说：“你是主人，坐中间。”

没有路，没有电。为了尽快让下党乡通上电，有人提议从临近乡镇拉线过来，但习近平同志不认可：“要致富，先修路，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架线拉线通电，我看就罢了。拉线过来，看似见效快，实际背了电费的包袱。下党有水利资源，咱们自己建个电站，等于抓了一只能下蛋的鸡。”

一席话，让在场干部群众频频点头。“他想得深、看得远呐！”刘明华说，现场会结束时，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要“以干得助”，“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91年1月，下党第一条公路建成通车；12月，一座250千瓦水电站建成。“这么多年，父老乡亲一直念着习近平同志的好，一直希望他有空再回来看看！”说起这些，刘明华眼眶有些湿润。

■ 连德仁（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他要我们抓“做”功而不是“唱”功

“习近平同志开展扶贫工作，‘实’字当头，‘干’字为先。”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回忆，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赶回寿宁县城时，已是晚上8点多，第二天一早，他就开会研究落实对下党乡的帮扶举措。

“他讲得很动情，‘下党有多苦，大家都看到了。下党不改变面貌，我们就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连德仁说，习近平同志让宁德地直机关18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对于乡亲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部门谈谈办法。

民政局最先表态，从局里挤出5万元，支持下党公路和电站建设：“我们真的是把口袋底都翻出来咯！”习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这很好，大家都要翻箱倒柜，竭尽全力。扶贫，就不要有所保留。

习近平同志还当场拍板：地委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其中32万元用于修路，40万元用于水电站建设。

针对下党乡帮扶工作，习近平同志说，水电项目，不能成为“胡子工程”，包括道路建设也要认真核定，办一件成一件，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两年内，下党的项目不要再报到地区来了，要集中精力办好电力和公路。“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带动解决实际困难，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先后9次到寿宁，其中3次专程到下党乡现场办公。原宁德地委秘书长李育兴说：“他不仅一贯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自己也始终以身作则，宁德地区124个乡镇，他去过123个。”

连德仁曾8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习近平同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干部一定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他说，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去找路子，去想法子，找准穷根，合力攻坚。这是指导党员干部做好扶贫工作的基本法则。”他说。

■ 刘智勇（时任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支书）：

他冒雨走泥路看茶山

闻名中外的“茶乡”福安社口镇坦洋村，曾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农村党建联系点。

1988年秋天，习近平同志轻车简从来到村里。“那天，他穿着深蓝色短袖，裤子上还有补丁，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当年刘智勇刚刚担任村支书，他没想到的是，“地委领导竟然这么年轻，穿着也这么朴素。”

座谈会上，刘智勇准备了汇报材料，刚要念，就被习近平同志微笑打断：“不用念材料，我问你答就好。”他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

“习近平同志问得非常细，现在种了多少亩茶？是什么品种？有什么困难？当时心里挺紧张，生怕答不上来。”刘智勇说，座谈结束后，习近平同志沿着山路，爬上村后一座茶山。“当时，天上下起小雨，他鞋子上沾满了泥巴。”

“他对我们说，坦洋村要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农村党组织，是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这些话，刘智勇一直牢记在心。

1989年2月，习近平同志邀请8位基层农民代表到地区行署，给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刘智勇的父亲刘少如也在其中，他是坦洋村老支书，带着大伙儿开荒种茶，脱贫致富。“父亲回来对我说，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夸他，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后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来坦洋。“他鼓励我们，坦洋要当领头羊，不断放大坦洋功夫红茶的品牌效应，因地制宜，壮大茶叶经济。还明确提出，坦洋发展好了，就要走出去，要与困难村结成对子，开展帮扶。”

很快，坦洋村茶叶种植面积增至3000多亩，村资产超过300万元，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了闽东明星村。“时常想起习近平同志当年冒雨走在山路上的背影，还有他鞋子上的泥巴，心里暖暖的。”刘智勇说。

■ 江成财（福安市下白石镇下歧村村民）：

他改变了连家渔民的命运

“没有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进，我们连家渔民可能还住在船上，漂在海上！”从船上搬到岸上18年了，江成财依然充满感激。

连家渔民，又称蜑民，就是居无定所、以船为家的渔民，他们常年以打鱼为生，日子大多比较清苦。

1997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闽东，对连家渔民易地搬迁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在习近平同志的力推下，福建连家渔民上岸工程迅速展开，到2000年，下歧村建成了6个渔民安置点，511户2310名连家渔民告别了海上漂泊岁月。

“2000年11月，我们搬到岸上新家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来看我们了。”江成财说。

来到江成财家，习近平同志仔细询问：家里几口人？现在做什么工作？收入怎么样？搬上岸过得习不习惯？“我告诉他，现在的生活很好很舒服。祖祖辈辈都在船上，做梦也想不到能上岸。以前在船上，怕风怕雨，片刻离不开人。现在住进了新房，终于能踏踏实实做事啦。习近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走到我家餐桌前，看到有鱼、有肉、有蔬菜，一边笑一边冲我点头。”

“既然上了岸，就要努力做事，做出个样子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时时激励着江成财。

“离开前，他对大家说，有困难就找政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任下歧村支书陈寿章回忆说。

“20年里，有两个不一样的我。”江成财说，船上的我，缺衣少食，到十来岁有时都没裤子穿；现在的我，做养殖，搞基建，住进了120平方米的大房子，日子红红火火。

2000年搬进新居时，江成财的儿子江陵才2岁。去年，江陵和朋友去海上体验了一次渔民生活，回来后告诉父亲，真不容易。“我对儿子说，要永远记住，是习近平改变了我们连家渔民的命运！”